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例

补蕙宇¹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 给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及价值导向。本文选取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当案例, 复盘了 2014 到 2024 年间,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宏观趋势, 同时也细致剖析了该专业招生规模的微观特征, 充分揭示出该专业研究生教育在规模不断扩张与结构逐步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矛盾。经研究可以发现, 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生培养规模在这十年间大约增长了 70%-80% 左右, 然而增速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 在治理模式、跨学科合作、产学研转化等方面, 也显露出诸多问题。新质生产力为土地资源管理赋予了三重属性: 技术赋能下的精准治理、生态资源的资产化和复杂系统的耦合治理, 这意味着学科逻辑在发生巨变, 从而促使过去更偏向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朝着“算法治理”与“绿色发展”相融合的国土空间治理新模式靠拢。研究认为, 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生教育应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 进行根本性转型, 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创新赋能”的转变, 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研究生教育; 土地资源管理;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14

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学者在相关专著中提到新质生产力。2023 年,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1], 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番论断不仅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对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提出了全新要求。新质生产力“不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与简单迭代, 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2]”, 反映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 以创新驱动促进高质量发展^[3], 以高素质人才为第一资源,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 其形成和发展根本上依赖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 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点。2024 年《学位法》的通过, 明确了学术与专业学位的分类培养与评价, 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审视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核心问题在于: 现行研究生培养体系能否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 学科专业设置与知识生产模式是否需要深度调整? 人才培养规格与能力结构应当如何重构?

土地资源管理(以下简称“土管”)专业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相应回答。就自身属性而言, 该专业具有显著的多学科融合特点, 所涉领域涵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学、地理学、经济学及信息科学^[4]等多方面; 从国家层面看, 国土空间治理朝向现代化发展、“双碳”战略稳步推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 都对人才培育提出了新要求。2025 年, 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发展论坛的举办, 将“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土地资源管理创新”确立为主题, 充分体现学科界对该命题的高度关注。

本文对 2014-2024 年土管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变化进行回顾与梳理, 分析其与新质生产力的适配性矛盾, 通过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从而构建高质量发展路径, 希望为学科改革给予一些有益参考内容。

二、新质生产力与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作者简介: 补蕙宇(199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区域发展。

高科技构成创新策源地：跟从前传统的资本投入或劳动力扩张的旧路径不同，新质生产力更侧重于原创性与颠覆性的科技突破。在研究生教育背景下，这一变化要求科研活动不再局限于“论文发表”，而应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和基础科学瓶颈。随着高科技渗透生产力的方方面面，数据已然成为新型生产要素，而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则变为先进劳动工具，这直接要求研究型人才必须注重跨学科的数字化素养，并提升前沿技术的应用能力。

高效能实现形态的跃迁：高效能并非简单等同于生产速度的提升，更核心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性优化。随着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改造，新质生产力实现了从传统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而使成本大幅降低。在教育体系中，这种转变主要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来实现，通俗而言便是研究生教育培养，不应呆在象牙塔，而应将所学知识精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减少因人才供需错配带来的“效能损失”。

高质量成就价值的归宿：高质量也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它告别了那种资源过度被消耗、环境持续破坏的粗放式发展，转而追求绿色、安全且高端化的产品及服务。就研究生教育领域而言，高质量不仅意味着评价体系的转变，同样使得教育目标不能再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大，而是更应注重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国际竞争力，并能引领未来产业变革的复合型人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切实保障人才的供给，又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达成高度的契合。

2.2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新质”属性分析

技术赋能下的精准治理：从前依靠测绘与行政划拨等手段来开展工作的是传统的土地管理模式，这种手段较为单一。但现在，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RS、GIS、GPS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S技术，要跟大数据、区块链等高科技相互融合，进而构建起“数字孪生”系统，这种系统能实现对土地的实时监测，精度可达到厘米级。这种转变，意味着土地利用决策不再仅仅依赖经验，而是逐步向算法驱动方向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高科技属性与智能化特征。

生态资源资产化的价值：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土地的职能早就跳出单纯的生产载体这个旧框架，摇身一变成了沉甸甸的生态资产。反映在学科内涵上，便是现在的土地资源管理已经将触角伸向了自然资源的确权、生态修复甚至于碳汇评价等诸多最前沿的领域。而它的这种“绿色”新质特征具体表现为：借助“三权分置”等相关制度创新来释放改革红利，进而让土地资源真正活起来。这些创举，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源优化配置，更是在流动中实现了土地的保值增值。

复杂系统的耦合治理：说到底，土地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本质就是人地矛盾最集中的火药桶。有了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土管专业对研究生的要求便随之增高，那便是学生要具备处理诸如城乡一体化发展、耕地红线保护还有城镇化进程与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难题的能力。这种跨领域调控的特征，促使人才培养模式向“大土管”视野转变，也就是借助对生产要素展开重新组合的方式，从而激发国土空间当中蕴含的潜在生产力。

2.3 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研究生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其关键在于从原有的“学科导向”逐步变为“问题导向”，这不只是为了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也是为了捅破学科之间所构建的壁垒。借助跨学科之间的协作，加上“研教一体”的科学实践，使得教育主体不仅能重新构建课程体系，还能调整评价标准，从而在实战中淬炼研究生的创新品格。

国家战略与产业耦合：研究生教育处于人才培养的最顶端，其相关动向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直接影响到教育供给侧。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口号下，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变得尤为重要，推动了教育模式从传统的校园封闭式向着更具有经济活力的动态优化模式转变，从而促进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同步发展。

数字技术与资源的转化：数字化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同时也是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因素。在具体教学场景中，智慧教室与仿真实验室的应用，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知识获取的方式。同时大数据技术让因材施教不再是空话，而是真真正正能让精准育人与个性化培养落到实处。通过把导师的学术积淀与科研投入更高效地转化为实打实的培养成果，以此来推动研究生教育向内涵式发展方向顺利跨越。

三、2014-2024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态势

3.1 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变化

通过查找教育部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数据背后的增长趋势十分直观。从2014年至2024年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翻了一番多，从2014年的62.13万人一路攀升至2024年的135.68万人，这十年间的涨幅达到惊人的118.4%，充分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也反映了国家在人才储备上的韧劲儿与潜力。



图 1: 2014-2024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统计 (单位: 万人)

数据来源: 教育部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5]

从图 1 的数据能清晰看出, 十年间的硕士与博士招生存在着细微差距。研究生招生规模从 2014 年的 54.87 万人一路涨到 2024 年的 118.57 万人, 算下来年均增长率稳在 8.0% 左右。相比之下, 博士研究生的扩招劲头更足, 从初始的 7.26 万人直接跳到 17.11 万人, 年均增速跑到了 9.0%。有意思的是, 硕士生招生依然占大头, 但占比却从 88.3% 小幅滑落到 87.4%, 这一升一降之间, 反映出国家对于博士培养力度的持续加大。

3.2 在学研究生规模变化

结合图 2 的数据来看, 在读研究生的整体盘子也跟着招生规模持续走高。到了 2024 年, 全国在读的研究生总数直接冲过了 400 万大关, 达到了惊人的 409.54 万人, 其中在读的硕士生人数有 341.92 万人, 博士生在读人数也达到了 67.62 万人, 这种人数的快速增长, 反映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 以及对高层次人才持续需求。



图 2: 2014-2024 年全国在学研究生招生人数统计 (单位: 万人)

从在读研究生的规模来看, 2024 年的数据相比于 10 年前来说增长了 121.7%, 其中硕士生规模翻了一倍不止, 增幅顶到了 122.7%。博士虽然门槛更高, 但在读人数也实实在在地涨到了 116.2%。在这段增长曲线中, 2020 年无

疑是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我国的在读研究生人数首次突破 300 万大关，达到了 313.96 万人。

四、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分析

4.1 土地资源管理硕士与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对比分析

表 1 土地资源管理硕士招生与全国硕士招生增速对比

时间段	全国硕士年均增速	土管硕士年均增速	增速差异
2014-2019	8.1%	6.5%	-1.6%
2019-2020	22.1%	15.0%	-7.1%
2020-2024	4.6%	3.5%	-1.1%

对照表 1 的数据来看，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硕士招生节奏明显慢半拍，增速始终没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 2020 年，因为疫情进行扩招的时期，该专业的增速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这其实也说明了土管专业作为传统的二级学科，其扩招方面具有的弹性是相对有限的。

4.2 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点院校类型分布

总的来讲，在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的培养上，不同院校有着各自的看家本领。例如农业类院校，像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这些大学，基本围绕土地的生产属性，研究大多集中在土地利用、耕地保护、农村土地流转及土地生态这类田间地头问题上；财经类院校如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则更习惯从经济与制度层面入手，对土地经济、房产经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钻研更深；相比之下，师范类院校如南宁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则擅长将土地研究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捆绑在一起，强调区域性的规划与可持续发展。而理工或综合类院校，如中国地质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南大学等，它们则明显更偏向于扎实的技术基础，在土地整治、矿山修复、测绘信息技术及土地工程等领域体现出极强的专业性。

五、国内外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与借鉴

5.1 国外典型培养模式分析

站在全球的视野上，研究生培养各有各的门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最讲究传承的是德国的“师徒制”，这种模式从中世纪源起，并在德国逐渐发展成熟。在这种模式下，导师不仅仅是学生科研上的引路人，更是学生职业人格与学术风骨的塑造者，师生之间具有深厚的情感链接；相比之下，美国的“专业化”培养模式更具有现代工业文明的特点，这种模式在现代大学中不断发展完善，靠着课程体系所具备的系统性与学分制应有的规范化，借助多元化的导师团队和密集的实验室协作，培养出来的学生通常具有高职业素养，并能迅速适应市场需求；再看比利时的那套“跨学科”模式就很有欧洲多元文化的交汇的特点，这种模式不主张学生死守一亩三分地，而是鼓励学生跳出单一学科的限制，强调知识的整合与复杂问题的解决，让学生能在法律、经济、生态及工程等领域多实践学习，从而培养出复杂问题的综合治理能力。

5.2 土管研究生培养的现实困境与错位

最直观的问题是，传统经验管理与数字治理需求的脱节。当前的课堂教育更偏重于宏观的理论教授，而现代企业所需的“数字孪生”、“实景三维”等技能，与当前的培养内容存在很大的偏差。学生在现代数智化环境中存在明显的技术短板，这也导致众多毕业生在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实时感知、智能决策”等领域缺乏竞争力，使学生陷入空有理论，而难于实践的尴尬境地；第二重困境则是技术手段与制度逻辑的壁垒。技术人员一头扎进数据堆，忽视了土地背后的产权逻辑与社会公平。而政策实施人员则受到技术门槛的限制，不懂复杂的定量分析，使得政策建议难以精准落地。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制约了学生在空间数字化呈现与制度合规化解读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再就是高精尖复合型人才的供给不足。当前社会“论文至上”的评价标准，又与行业急需的“全域整治、生态修复”等实务环节是脱节的。产学研合作常常只是表面工程，缺乏实质性的深度融合。结果便是具备“懂政策、精技术、善统筹”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稀缺，这种供给的不足，实实在在影响了国家战略实施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效能。

六、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优化路径

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土地资源管理应打破传统的行政审批逻辑，逐步转向数智治理、绿色发展、空间优化的综合治理模式。为此，研究生培养方案也应打破学科界限，构建“技术—生态—法治”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

6.1 定位重构：由“公共管理”向“国土空间治理”战略转型

在新形势下，研究生培养方案需进行转型，不能再重复过去单一的行政管理思路，应该确立以“国土空间治理”为核心的学科体系，把土地资源管理、城乡规划和生态监管等领域拧成一股绳。具体操作上，则通过“资源评价、智慧国土、生态安全、规划法治”四大核心板块的构建，实现学科从“静态登记”逐渐转向“动态感知与精准治理”的跨越。

6.2 课程体系革新：数智赋能与交叉学科深度融合

在课程设计上，也应该紧跟时代。将数智化技术引入课堂设计当中，面对海量时空数据之时，学校可以引入卷积神经网络（CNN）、遥感自动识别、区块链技术等课程，让学生不再拘泥于书本知识，而是能掌握“国土空间大脑”等技术实操能力。并且紧扣“双碳”目标，教会学生运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GEP）、碳汇监测、生态修复工程学等前沿工具，将零散的生态资源变成可量化管理的绿色资产，才能让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真正看得懂，用得上。在方法论上，也不应只停留在传统的统计分析上，得加入强化空间计量、系统仿真及因果推断等训练，用来提升学生在复杂利益冲突中的决策能力。

6.3 培养模式创新：构建“政产学研”多元协同生态

培养模式创新方面，核心则是应打造一个多方参与的协作团体。首先是校企联合的项目制培养，紧盯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需求，推行定制化培养方案。将企业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智慧城市底座研发等方面的真实需求转化为研究生的科研课题，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积累宝贵经验。同时完善“多师制”指导模式，不仅仅是校内导师，还应加入行业专家与法律顾问的导师组，强化学生的法学功底与经济素养，以此来逐步攻克集体土地入市等复杂制度难题。并依托跨校协作平台，推进校际间师资互访与科研协作，将各家优势融合，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性研究生培养联合体。

6.4 评价体系改革：分类评价与过程赋能并重

评级系统的改革，应把“分类评价”与“过程赋能”抓实，不应用同一套标准来评价所有学生。首先，学硕与专硕应该进行差异化考核，允许专业型硕士通过调研报告、方案设计、软件著作权等形式申请学位，应侧重考察学生解决实际治理问题的实效。其次，打破“唯论文”论的评价标准，把专利授权、行业标准制定、学科竞赛获奖、高水平政策咨询报告等也纳入成果评价体系，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更重要的则是建立过程性激励，完善优秀应用型论文评选制度，鼓励学生在空间效率优化和生态价值实现等国家战略方向上可以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

七、地方院校的破局实践：南宁师范大学的“南师模式”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是土地科学学科的人才培养的具体化，旨在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以及从事学科研究的研究型人才^[6]。南宁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南师大”）土管专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与区域发展紧密相连的学科优势。

7.1 战略定位：深耕八桂大地，构筑差异化科研标签

南师大土管专业在学科定位上很清醒，选择深耕八桂大地，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科研标签。没有去卷常规的平原研究赛道，而是选择广西特有“南方石山”与“边疆治理”这两块阵地。通过在石漠化治理、矿山修复及山地规划等领域的长线投入，掌握了某些不可替代的学术话语权。同时，该专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紧密融入了地方治理体系，凭借自然资源部创新平台，加上学院的土地规划甲级、测绘乙级的双重资质，南师大与广西自然资源厅形成了紧密的捆绑关系，科研便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直接服务于广西的山水之间。

7.2 模式创新：新工科赋能，实景三维与管理逻辑的深度植入

依托于新工科的建设思路，南师大土管专业在人才培养上玩了一套组合拳。核心是把技术训练与管理思维紧密结合。在校学生不仅要掌握“测、绘、规、估、表、籍”这六项核心技能，也要将工程技术与管理思维进行深度融合，培养出既懂管理又精测绘的复合型人才。更具前瞻性的是学院将实景三维（Real 3D）技术纳入核心课程，通过无人机遥感、点云建模等实战演练，学生们不再盯着几张二维平面图纸上谈兵，而是直接把问题放进三维时空中，进行实际的治理优化。

7.3 成效评价：双能驱动，高水平科研与行业认可的双赢

在学术竞争力这块，学校土管研究生能有学术成果，也能获得行业认可。他们在 *Land Use Policy*、《中国土地科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文量不断增加，展现出很强的学术前瞻性与理论构建的深厚功力。再有的便是行业认可度，毕业生兼具政策分析与空间建模的双重硬实力，使得他们在华南、西南等地区的自然资源系统和测绘规划院所都有不错的行业口碑。

八、结论与建议

8.1 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 2014-2024 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通过理论解析、数据实证与模式对比，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转型逻辑。核心结论如下：

首先，2014-2024 年间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 62.13 万人增长至 135.68 万人，十年间增长 118.4%，翻了一倍多。而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从约 400-500 人增长至约 720-860 人，十年间仅增长 70%-80%，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增速差异说明该学科正处于从简单的“规模扩张”向“内涵转型”的阵痛期，传统的行政管理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对“数智化、绿色化、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归根结底，社会上存在较明显的供需结构性失衡的现状。

再者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土地从单一的承载物转变为“数据-空间-生态”三方融合的复合生产要素。这样的变化，推动了学科的转型，使学科从传统的公共管理行政逻辑，向着以“算法治理”为核心、“绿色发展”为底色的全新国土空间治理新格局转变。

最后便是培养模式方面，既要注重本土化发展，又要遵循全球化视角。通过对比德国“师徒制”的精耕细作、美国“专业式”的规模优势和比利时“跨学科”的多元融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土管教育应坚持兼容并蓄、协同发展的路径。在实践层面，南宁师范大学的“南师模式”证明了地方院校深耕区域特色与技术赋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然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全国同类院校提供了“差异化破局”的可行样本。

8.2 对策建议

第一，学科重构方向上，土管研究生的培养应从传统的碎片化交叉领域转向更为紧密的深度逻辑耦合。具体而言便是，将硬核技术嵌入学科目标当中，例如把 Python 空间建模、深度学习、遥感大数据处理列为学硕的必修课。同时考虑到绿色发展的需求，在课程中加入前沿模块，如土地碳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等。为了确保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与实用性，在课程设计上应构建“制度逻辑+技术算法+实务场景”三位一体的学分体系。

第二，师资队伍转型上，核心应解决的是学术与工程脱节的问题，为此应构建一套双栖型评价体系，推行双导师制，并且把挂职锻炼落实，让中青年教师定期赴自然资源部门、规划院进行业务实践，确保研究能脚踏实地。同时打破“单打独斗”的带学生模式，尝试跨学科组团，把管理、地信、生态等多学科的导师拧成一股绳，让学生能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第三，在国际化水平提升方面，应积极主动贡献“中国土地经验”，输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方案。这不应是空谈口号，而应该实实在在总结我国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耕地保护制度中的经验，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进行推广，开展人才联合培养。除此之外，还应该在国际标准制定上掌握一定话语权，利用国产卫星数据优势，深度参与全球土地监测等国际项目，从而提升中国在空间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结语：土地资源管理的研究生教育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我们不能固守着陈旧的培养模式，唯有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实施从人才培养目标到科研范式的全方位重塑，方能培养出支撑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谢珍珠, 沈广旭.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策略选择[J]. 高科技与产业化, 2025, 31 (01): 103-105.
- [2] 李森.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道路[J]. 高校教育管理, 2024(01):1- 23.
- [3] 申国昌, 贺鹏丽.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内生逻辑、规格要求与重要路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01):31-37.
- [4] 张佰林, 陈雪婷, 刘虹吾, 张欣瑜. 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基于自然资源“两统一”视角[J]. 高教学刊, 2025, 11(32):162-165.
- [5] 教育部. 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2025-06-11.
- [6] 费罗成. 技术型管理人才导向下的土地资源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实践——以安徽师范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12):270-273.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 Taking th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as an Example

Bu huiyu¹

¹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Nanning 5301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brought a brand-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value orientation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as a case, reviews the macro trend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from 2014 to 2024, and also meticulously analyzes the micr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this major, fully revealing the phased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this major.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master's students i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70% to 80% in the past ten years, but the growth rate is still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aspects such as governance models,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dows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three attributes: precise governance enabled by technology, asset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coupled governance of complex systems, which means that the disciplinary logic is undergoing a major change, moving from a model that was more inclined towards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towards a new model of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that integrates "algorithmic governance"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hould tak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the engine for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shifting from simple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innovation empowerment", and cultivating mor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raduate Educatio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